

《與談》

## 重建信任——安全——公義的緊密關係

◎張世雄

「信任」和「公義」分別是今天兩個併列主題的核心關懷。首先，尊重專業倫理是關於抽象的信任關係，及其制度化基礎的歷史構成問題。在另一方面，重視弱勢生存權益則是要追求人際倫理間一種公平的正義。信任和公義不可分離地連結著（社會）安全（侷限化了危險的不確定性焦慮和日常性威脅）的問題，讓人們一面得以遠離了人與人間持續爭戰掠奪的自然放任狀態，一面還能維持著相當程度的個人自由與權益擁有。那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之一，也是近世紀自由民主政治，甚至是市場機制經濟的政治——倫理基石。

然而當前這兩項關於人類行為準則的政治——倫理問題，無論是在政治經濟層面或是社會文化層面，都已遭到相當高度的挑戰。前者飽受的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嚴厲攻擊，

後者則頻頻面臨到後現代主義暨文化研究的解構與消費主義文化的人格個性蝕毀。也就是說，這兩個議題可以、甚或是必須同時理解為新世紀的倫理挑戰和人性的抉擇。

在搜尋和羅列兇手的清單時，全球化自一九九〇年代起就高掛在十大通緝要犯的排行之首。但我們也不可忽略這一股歷史衍生力量的相關前導條件與連鎖問題。除了冷戰對峙和共產政權相繼結束的因素外，來自戰後西方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社會安全體系）的種種內在危機，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就開始威脅著自由民主政治的社會穩定條件：信任和公義。專業—官僚體制對社會需要的缺乏回應性，一直是當代反（福利）國家情結的大眾不滿源頭。而大眾政黨民主對弱勢者生存困境的緩不濟事，更讓公義理念成為窒礙難行的高調。就在來自新左派、新右派的雙邊攻擊中，讓英美為首自由民主國家的公共與社會政策，以私有化（財產權移轉）或民營化（經營權移轉）為名的進行縮減，「國家失靈說」蔚為一時風潮。被夾在市場和社區之間的國家，開始被大幅地拆解和改造為一去公共化的管理機器，同樣地，從官僚體系掙脫開來的專業主義雖有猶疑，卻快速大步向市場靠攏去。

又仔細深究，人口老化與依賴比漸高、家庭／性別關係不穩定和職（就）業／階級結構的變化，早已相互地牽動著社會福利制度的假定條件和運作邏輯。諸如穩定的結婚與生

育行為、男性就業養家／女性無酬管家（照顧）的家庭組合模式、儲蓄和消費行為模式、全時專職勞動的就業模式、和高同質性的勞動階級與團結行動，這些曾經穩固的社會組成逐一消散和瓦解。自由民主政治下的福利國家，當如何因應後工業社會、後福特主義、後生產主義、後物質主義、後現代主義、新個人主義，以至所謂的風險社會、資訊社會、知識經濟或全球化等，一連串描述和分析社會經濟結構鉅變的挑戰要素，自然成為人們在考量新的政治—倫理構成原則與行動策略時，必須用來辯護和支持的理性討論論述。也意謂著任何懷舊式捍衛過去的策略選擇，包括一再被我國新舊政客當成選戰牛肉的經濟成長驅動式發展型國家，都成為既不可欲也不可行的政策選擇。

以回應全球化為名，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成為所謂「第三條路」的首席理論家和政策辯士。他試圖結合（或謂跨越矛盾）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去管制市場和社群主義的道德威權國家，支持新工黨政府標榜的「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的公民資格（落實為所謂的工作福利）、現代（新）管理主義的國家、志工服務的市民（參與）社會和競爭性創新的市場經濟。必須注意的是，面對國家認同的薄弱化，公民責任卻被強化在弱（劣）勢團體身上；國家屈服於資本的無力感，則轉化為管理主義國家對公共服務的契約外包和績效考核管理；知識經濟成為用企業經理取代官僚規則與專業權威，推動知識的商品化生

產包裝與行銷技術管理；共善的人類發展觀點只被用來當作掩飾階級不平等的口號，強化國家的新家長主義能力和個人習性教養的積極角色。

如何重建新世紀倫理的課題，涉及的是今日風險社會的成因，不只是人為自然風險的極端化與日常化，也來自於社會不安全和生存缺乏保障的威脅日劇。缺乏公義的社會，無法確保安全與信任的穩定連結，也成為對人性文明發展的根本考驗。因此，倫理的重建和養成對新世紀來說，是絕對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源：那提供了制度選擇、政策執行、以及社會文化批判的依據，以重建信任——安全——公義間的緊密關係。

然（準）第三條路對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的倫理設定，不是空洞無力的，就是（由哲學的保守主義衍生為）隱性的道德威權。共善的人性發展目標，往往在為全民福祉服務之前，已成為如何提升弱勢者道德責任的倫理依據。裹著糖衣的全球市場資本主義，預先讓政府和專業者屈服為其增加經濟競爭力的利器。志工的道德形象用來取代國家對公民的責任，強化施捨與接受者間依賴式的信任關係，一如渴望包公來諷刺和破壞民主法治的制度價值。我們必須找尋新的出路。

在晚近世紀末的歐陸，由荷蘭和丹麥等小國開啟了重大社會經濟的改革，以尋求社會保障、就業穩定和經濟成長間的目標協調，也成就了一些瑕不掩瑜的表現。以歐盟為單位

的歐盟社會模式則在官方號倡和諸多學者的合力下，試圖為新世紀勾劃出一個新的福利體制及其（特別是世代）倫理基礎，來因應全球化和後工業社會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與政治文化價值的轉化。從這些經驗考察中，或可供辨識出一條新的歷史出路：透過後工作（或後就業）社會的烏托邦想像，奠定平衡（個體間）公義和（人際間）關懷的政治—倫理，我們方得以駕御全球化的進步又摧毀動力，重建社會安全體系和鞏固社會信任關係。也就是說，只有在重視弱勢權益與生活保障的新社會脈絡中，尊重專業倫理的原則方能在制度信任的基礎上被承認和實踐。